

脾气暴躁的教授

伊恩·库梅卡瓦写了一本关于阿瑟·塞西尔·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的有用指南。庇古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其前任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继任者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本书部分是理论阐述，部分是传记，阐述了20世纪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剑桥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剑桥知识界对于将道德和道德判断用于经济学研究非常感兴趣，这来源于自由家长式改良主义的深厚传统。库梅卡瓦清晰地追溯了这种思想的轨迹，从在1914年以前的世界中通过知识和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悲观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深深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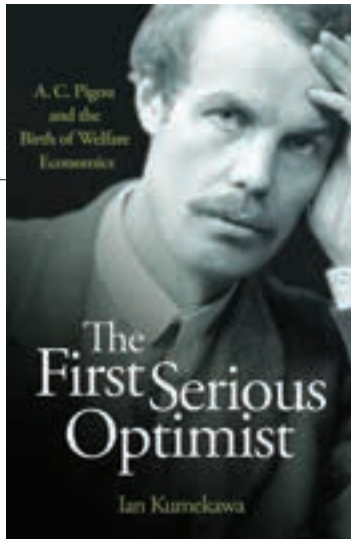
与凯恩斯一样，庇古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在参加战地救护车服务时经历了最可怕的战争，而且他在应征入伍时似乎也不想登记成为出

庇古相信大人物与善良者的共识。

于道义原因而拒服兵役者。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从一个爱社交的快乐单身汉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孤独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庇古觉得属于凯恩斯的新剑桥已经超越了自己，嘲弄了自己，也忽略了自己，因为凯恩斯在自己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将其不公平地形容为过时的古典经济学稻草人，而庇古也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

庇古相信大人物与善良者的共识，有时甚至会牺牲自己的有力观点，比如有利于和谐的自由贸易。凯恩斯作为好斗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让庇古震惊，他认为不同意见的报告是“无教养的”。

库梅卡瓦正确地展示了庇古对于税收是处理外部性最好方法的分析，其中的外部性与今天的环境问题有关。碳税就是庇古税的一个很好的例



伊恩·库梅卡瓦

《第一个严肃的乐观主义者：庇古与福利经济学的诞生》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7年，344页，35美元

子，因为碳税匹配了生产者在污染等方面的成本。

本书并没有将庇古描写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作者解释说，“虽然庇古打算帮助穷人，但他并不尊重穷人”，而且他“认为大多数人都完全不适合作出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决策”。这是19世纪家长作风最糟糕的表现（另外庇古还有厌女症，本书中描写了庇古试图解除琼·鲁宾逊的剑桥大学讲师职位，令人齿冷）。

但出人意料的是，库梅卡瓦遗漏了庇古思想中与今天最相关的部分，以及奠定其损害控制和资源保护思想的部分。另外，与同时代人相比，庇古更深切地关心代际公平，对于一位没有子女的单身汉来说，这更令人奇怪。当代人有强烈的动机将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后代，这一发现推动了庇古大部分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他在自己1932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国家应该进行干预，因为国家是未来人的监护人。“（……）国家应该保护未来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反对我们非理性折现的效应，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偏好强过后代的效应。”这的确是一种现代思想，即使它是由一位坏脾气的爱德华时代教授所表达的。FD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和IMF的历史学家。